

2025年第13期新闻稿：罗多尔夫·沃尔什会要求我们代他写下的内容



《新秩序》，德梅特里奥·乌鲁丘亚（阿根廷）作于1939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24年9月的一个晚上，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伊（Javier Milei）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莱萨马公园（Parque Lezama）的一大群人面前。他身穿标志性的深色皮夹克，声音洪亮地发

表演讲，台下群众如饥似渴地倾听着每一句话。“这些就是造谣挑衅者，”他说，“腐败的记者、见不得光的人物。这些就是造谣挑衅者。”接着，他指着台下的人说，他们之所以“隐形”，是因为记者们“垄断了话筒”。这种尖锐的言辞，是对唐纳德·特朗普那句记者是“人民公敌”的直接翻版（而特朗普的说法本身又呼应了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72年对顾问亨利·基辛格所说的话：“媒体是敌人，媒体是敌人，体制是敌人，教授是敌人，教授是敌人。把这句话在黑板上写一百遍，永远不要忘记。”）。这种言论并非没有代价。自米莱伊于2023年12月上任以来，针对记者的攻击愈演愈烈。

阿根廷有着一段令人痛苦的历史。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它近四分之一的的时间处于军事统治之下：1930年至1932年、1943年至1946年、1955年至1958年、1962年至1963年、1966年至1973年，以及1976年至1983年。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最后一次——由陆军、海军和空军三军将领组成的军政府统治了国家将近八年，至少“失踪”（委婉说法，实为谋杀）了三万人，并从左翼家庭中掠走了数百名婴儿。我这一代的左翼人士几乎全被那场独裁杀害。

那场独裁政权有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名字——“国家重组进程”（National Reorganization Process）。这个“进程”意味着将全国的左翼力量——从工会人士到共产党员再到记者——血腥肃清（本期新闻稿中的所有艺术作品都出自阿根廷的共产党画家和摄影师，借此向他们的广博才华致敬）。在一封令人震惊的致该国军方领导人的信中，记者罗多尔夫·沃尔什（Rodolfo Walsh）写道，关于这些大规模屠杀，“你们在最高层策划它们，在内阁会议上讨论它们，以三军指挥官的身份下令实施它们，并以政府军政府成员的身份批准它们。”

RODOLFO WALSH

1927-1977



tricon^ontinental

48年前的1977年3月25日，年仅50岁的罗多尔夫·沃尔什死于海军机械学校（ESMA）。在此之前，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圣胡安大街（San Juan）与恩特雷里奥斯（Entre Ríos）交汇处被一队士兵连开数枪击中后带走。罗多尔夫·沃尔什刚刚寄出多封致军政府的信件，他们就找到了他并向他开枪。多年后，当其中一名枪手埃内斯托·韦伯（Ernesto Weber）被送上法庭时，他说：“我们干掉了沃尔什。那杂种躲在一棵树后面，用一把0.22口径的枪抵抗。我们朝他开枪，他就是不倒下，那杂种。”



《拾荒者胡安尼托》，何塞·安东尼奥·贝尔尼（阿根廷）作于1978年

几年前，一位年轻记者写信问我，能否给她列一份我欣赏的记者名单。我翻出一本旧笔记本，找到了当时为她写下的名单。名单不长，只有十个名字：威尔弗雷德·伯切特（Wilfred Burchett）、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理查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约翰·里德（John Reed）、阿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罗多尔夫·沃尔什和艾达·威尔斯（Ida B. Wells）。这些记者的作品有几个共同特征：第一，他们拒绝充当资本主义媒体的传声筒，坚持从工人和农民的立场讲述世界故事；第二，他们不仅报道事件，还将其置于我们时代的重要进程中；第三，他们不仅写作，还用心塑造作品，情感基调源于他们认为读者需要知道的事实；第四，他们不仅站在受压迫者的立场写作，而且相信他们，并以真诚而非讽刺的态度书写世界的斗争。伯切特，这位澳大利亚人，是首位进入广岛并向外界揭示原子弹真实后果的非日本人；马尔克斯，这位哥伦比亚人，揭穿了本国政府的谎言，讲述了1955年在加勒比海遇难的卡尔达斯号（Caldas）驱逐舰水兵的真实故事；威尔斯，这位美国人，详述了私刑处死的恐怖景象——这是种族主义在正式废除奴隶制度后延续奴役结构的方式。这些都是有着伟大故事可讲的优秀作家，令人敬佩。

这些作家中有沃尔什。虽然我只读过他的一本书《屠杀行动》（Operación Masacre）（1957年）和他遇害前写下的最后一封信，但这一本书关于那一起事件的叙述，已足以奠定他的声誉。

沃尔什并非天生属于左翼阵营。他喜欢下棋和解谜。一天晚上，他在一家咖啡馆下棋时，听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发生了一起残忍的杀戮案——一些男子因被指煽动武装叛乱反对推翻胡安·庇隆总统（Juan Perón）的军官而遇害。几天后，沃尔什找到其中一名幸存者胡安·卡洛斯·利夫拉加（Juan Carlos Livraga），并听到了他的故事。这一切改变了他。沃尔什从此成了一位对新闻故事如痴如醉的记者。

故事始于1956年6月9日，当天数名男子聚集在弗洛里达（Florida）社区听收音机直播一场拳击赛。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阿根廷选手爱德华多·豪尔赫·劳塞（Eduardo Jorge Lausse）将在当年9月击败古巴传奇拳王“加维兰小子”（Kid Gavilán），而那晚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月亮公园体育馆（Estadio Luna Park）迎战智利中量级拳王翁贝托·洛亚萨（Humberto Loayza）。这些听广播的男人并不知道，当晚会有一场由效忠庇隆的军官发动的起义——他们与此毫无关系。然而，士兵还是来到他们的街上，将他们逮捕，押到一处垃圾场，让他们跑，然后开枪射击。七个人活了下来，有的拼命逃跑，有的装死躲在垃圾堆里。

沃尔什得到线索后，聘请记者恩里克塔·穆尼斯（1934 - 2013）与他合作调查。穆尼斯的笔记在2019年出版为《一次调查的历史：罗多尔夫·沃尔什的屠杀行动——一次新闻（和爱情）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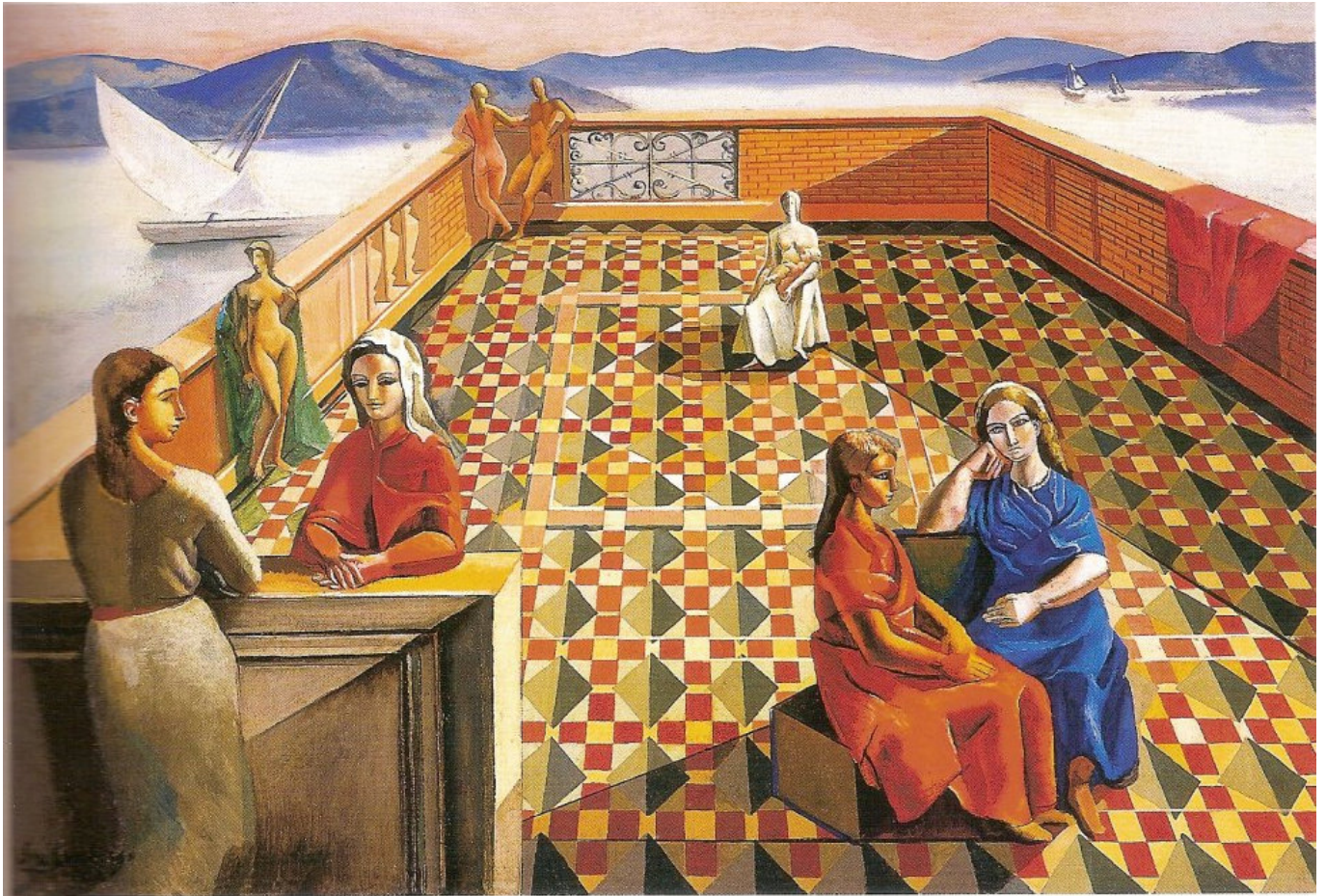
（Historia de una investigación. Operación masacre de Rodolfo Walsh: una revolución de periodismo (y amor)），详细记录了他们寻找幸存者及其故事的调查方法。他们发现，例如逮捕发生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前，而谋杀却发生在宣布之后。这意味着军方冷血地杀害了与当晚政治事件毫无关系的工人阶级男子——他们只想听劳塞在擂台上击倒洛亚萨。



《玉米丰收》，胡安·卡洛斯·卡斯塔尼尼奥（阿根廷）作于1948年

没有一家主流媒体愿意刊登沃尔什的调查。他只能在《多数派》（*Mayoría*）、《民族革命》（*Revolución Nacional*）等多家小型期刊上连续发表文章，直到“西格拉出版社”（*Ediciones Sigla*）出版了《屠杀行动》（*Operación Masacre*），该书献给穆尼斯（*Muñiz*）。沃尔什和穆尼斯希望将凶手绳之以法，但这并未实现。涉案警察局长德西德里奥·费尔南德斯·苏亚雷斯（*Desiderio Fernández Suárez*）直到2001年仍安然无恙地死去。

1959年，沃尔什前往古巴，为革命所振奋，结识了阿根廷同胞切·格瓦拉（*Che Guevara*），并凭借自己对谜题的热爱，破译了美国的信号，从而在1961年猪湾（*Bay of Pigs*）入侵前向古巴政府发出了警告。在古巴，沃尔什在古巴国家通讯社“拉美通讯社”（*Prensa Latina*）工作，随后加入阿根廷共产党异议人士创办的《第三世界问题》（*Problemas del Tercer Mundo*）编辑部，之后又担任阿根廷总工会（*CGT*）机关报的编辑，该报从1968年5月出版至1970年2月。在CGT工作期间，沃尔什调查了1966年5月13日金属工人联盟领导人罗森多·加西亚（*Rosendo García*）在与奥古斯托·蒂莫特奥·万多尔（*Augusto Timoteo Vandor*）领导的另一派工会成员交火中被杀的案件——万多尔本人在1969年被枪杀。沃尔什创作了两本影响阿根廷政治格局的凶杀案调查书：《谁杀了罗森多？》（*¿Quién mató a Rosendo?*）（1969年），讲述加西亚遇害事件；以及《萨塔诺夫斯基案》（*Caso Satanowsky*）（1973年），调查了1957年律师马科斯·萨塔诺夫斯基（*Marcos Satanowsky*）被国家情报机构谋杀的案件。



《露台》，利诺·埃内亚·斯皮林贝尔戈（阿根廷）作于1930年

1969年，一位采访者问沃尔什的政治立场。“显然，我得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沃尔什回答，“但我是个糟糕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读得很少：我没时间在意识形态上自我教育。我的政治素养更多是经验性的，而非抽象的。”这是一句诚实的话。沃尔什的本能倾向于古巴革命，他加入了政治组织，但他的心属于新闻事业。当美国政府的“秃鹰行动”（Operation Condor）在阿根廷展开，军方行动成为其中一部分时，沃尔什与卡洛斯·阿兹纳雷斯（Carlos Aznarez，现为《拉美概要》(Resumen Latinamericano)主编）以及莉拉·维多利亚·帕斯托里萨（Lila Victoria Pastoriza，曾遭军政府酷刑折磨两年，现为《哈罗尔多》(Revista Haroldo)杂志撰稿人）一起创办了地下通讯社（ANCLA）。当沃尔什的女儿玛丽亚·维多利亚（María Victoria）——她当时正参与反对军政府的武装斗争——与阿尔韦托·莫利纳（Alberto Molina）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军队包围时，他们举起双手，说道：“ustedes no nos matan; nosotros elegimos morir”（你们不是杀死我们的人；我们选择自己死去），随后开枪自尽。之后，沃尔什拿出打字机，开始撰写一封长篇致军政府的信，并在政变周年之际寄出。这封信应该成为所有人必读的作品。

这封信兼具事实的质感与奇诡的想象：“1976年8月，一位在科尔多瓦圣罗克湖（San Roque Lake）潜水的当地居民发现了一个水下墓地。他去了警察局，警察不予受理；他又写信给报纸，报纸没有刊登。”



《五月广场的母亲与女儿》，阿德里亚纳·莱斯蒂多（阿根廷）拍摄于1982年

报纸同样不会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谋杀与监禁事件。它们为奥斯卡奖和巴黎时装周的浮华所迷醉，无暇顾及米莱伊的自由至上主义疯狂——为亿万富翁利益而破坏体制的行径。如果媒体真的写了什么，米莱和特朗普就会称他们是“人民的公敌”，是这个或那个政府的代理人。

与此同时，这些披着人皮的怪物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欺骗自己的人民，把国家财富拱手交给一个不愿再与我们共享这个星球的阶级。这正是罗多尔夫·沃尔什会写的内容——也是他会要求我们代他写下的文字。

热忱的，

Vijay

